

The “Derailment” of Online Populism in China's Post-Epidemic Era

Jinying Wu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2803444838@qq.com

Abstrac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while national credibility and intellectual authority are recovering and rebuilding, online populism is also active. It often appears in the form of public opinion on various Internet platforms. Online populists exploit the Internet's self-media nature and low-cost advantage for dissemination. This makes online populism highly "accessible", easily causing a "square effect" and "polarization effect". It impacts China's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thus impeding the building of China's ideological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rnet, online populism shows "derailment" tendencies during dissemination, and its irrational factors and logical fallacies are also gradually revealed.

Keywords: Online Populism; Post-Pandemic Era; National Construction

中国后疫情时代下的网络民粹主义“脱轨化”发展

巫金颖

马克思主义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广州 510000，中国

2803444838@qq.com

摘要: 在后疫情时代，国家公信力以及知识分子权威尚在恢复和重建之中，这一时期也是网络民粹主义的活跃时期。网络民粹主义通常以舆论形态闪现于各种互联网平台之中。网络民粹主义者充分利用了互联网传播的自媒体属性和低成本优势，使得网络民粹主义传播带有很强的“可及性”，极易容易引发“广场效应”和“极化效应”，对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利于我国思想体系的构建。但是也正因为网络的复杂性，网络民粹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同层面的“脱轨”倾向，而网络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和逻辑误区也逐渐暴露。

关键词: 网络民粹主义；后疫情时代；国家建设

1. 引言

网络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想，其在我国的发展与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新冠疫情限制了人类的现实活动，导致许多社会问题被通过网络的途径呈现出来，而网络民粹主义者则抓住了这样的宣传机会，大肆宣传民粹主义的平民思想观念，放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分化社会群众，孤立所谓的社会精英，并且反对社会建制，攻击社会建制结构的不合理。虽然在后疫情时代很多矛盾也迎刃而解，但是网络民粹主义者仍会利用疫情的破坏性以及民众对生活的不满情绪来攻击国家话语体系和政府公信力。本文将从后疫情时代的网络民粹主义生存土壤入手，解剖当代网络民粹主义的社会背景，并且通过网络民粹主义的特性，进一步分析其本质上的矛盾性以及其对于“平民主义”的“脱轨”表现。

2. 网络民粹主义的土壤

2.1 我国的宏观背景及其整体趋势

当下，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宏大时代背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设不断完善；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运行机制不断优化；国家工作人员录用和考核机制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竞争，不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中促进国内国际的友好交流。现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克服流通难点，激发市场活力，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供给端与需求端，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我国努力推进共同富裕，202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计划，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伟大跨越。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2015年5月4日他与北京大学学子座谈，也多次提到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国内外不同场合的活动与讲话中，展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精神志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他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那么，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人民的文化事业以及文化产业得到蓬勃发展，国潮、国风一次又一次刷屏网络平台，我国文化自信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总的来说，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朝着第二个百年计划——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不断前进。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的指导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是正确的。而民粹主义最终是无法在我国得到长远发展的。

2.2 新冠疫情的破坏性

2019年底，新冠病毒被发现，不久后便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爆发式传播。直至2022年底，我国正式宣布放开疫情防控，实行疫苗的全民接种，全国百姓生活才逐渐恢复常态。而在这三年里，新冠疫情给我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尽管疫情初期，我国就实行严厉而有效的防控措施，新冠病毒仍然夺去了不少中国人民的生命，消耗了大量国家和社会财产，引发不少社会问题。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公众对事件的责任归属、稳定性和可控性判断会影响政府公信力。[1]当时人类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尚少，疫情问题带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一些专家通过权威途径发布的信息并不一定可以全部应验，甚至有可能出现误判。加上疫情防控所造成的空间限制，人们实地考察的机会也更加少，谣言可以凭空捏造，网络成为谣

言的最大温床，这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也给国家主导的权威话语体系以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信力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

由于新冠疫情是全球性的重大灾难，它对于世界经济的打击是十分严重的。不同的国家对待疫情的应对措施以及风险预判存在很大差异，这也导致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困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贸易的失调对于国内经济的打击也是巨大的。因此，疫情对我国经济的打击很大一部分反映在这些年的失业问题以及就业难等民生问题上面。就业率低，失业率高，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的经济活力无法得到正常调动，无业游民激增，社会动荡因素加剧。失业者对社会的不满成为民粹主义发展的最好催化剂。

虽然新冠疫情已进过去，但是我国发达的信息网络系统作为新冠疫情的见证者，已然储存了所有关于疫情的叙述表达，当然也包括疫情带来的创伤遗留。而其中有益于民粹主义的素材便为民粹主义留下了很大的发展和利用空间，成为后疫情时代民粹主义者攻击主流意识形态，对抗国家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发展更多民粹主义者的重要工具。

2.3 信息时代的两面性

十年来，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提升，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提高近 40 倍，移动通信网络由 3G 演进到 5G，并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 5G 网络。网民规模增长近 1 倍，从 2012 年 12 月到 2023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从 5.64 亿增加到 10.79 亿，互联网普及率从 42.1% 提升至 76.4%，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互联网企业蓬勃发展，我国互联网上市企业数量从 50 余家增长至接近 160 家，头部互联网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互联网发展不断开创新的局面，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从 2012 年到 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 11 万亿元增长到 50.2 万亿元，在互联网应用、网民数量、人工智能发展等多方面领跑全球，中国真正意义上走进了信息时代之中。伴随着巨大的便捷优势，信息时代的另一面也在逐渐显现，那就是以虚拟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信息交流表现。信息时代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虚拟的层面打破了传统意义的时空局限，而无法通过现场的、物理的、现实的途径来取代现实的接触对信息交流做出贡献。由此，发表言论，宣传思想，扩大理论影响力的成本更加低，信息网络沦为思想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的理论宣传阵地、思想对抗阵地、和人才挑选阵地。

网络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恰恰与民粹主义的“平民主义”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点。第一，网络使用者数量庞大，且有闲暇时间的使用者多为非精英阶层，这类网络使用者接触到宣传性网络信息的机会更多，对于民粹主义者的“民主”说辞也更加容易接受。第二，网络使用者多为青少年群体，这类群体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的人生尚处于一个充满更加多不确定性的阶段，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同时又时常会被现实中的困难所挫败，这类人群及其容易在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将问题所在归咎于当局建制的不足以及精英阶层的敌意，这与民粹主义者反建制、反精英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契合度。[2]

3. 网络民粹主义

3.1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将政治权力归还给“普通人民”，并将“精英”或“建制”视为对普通人民的压迫者或剥削者。[3]民粹主义通常会强调民众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的直接参与，并批评现有的政治体系和精英阶层的作为。虽然民粹主义的形式和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但其核心特征包括以下几点：

(1) 反对“精英”和“建制”：民粹主义者通常将社会分为“普通人”和“精英”，并认为精英掌握了权力并且从中获利，而普通人则被边缘化或剥削，沦为精英阶层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对精英阶级带有天生的敌意，并且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有着“离经叛道”的态度，倡导打破现有的政治体系和建制，以实现普通人民更大程度的权力和控制。

(2) 有区别于精英阶层的民粹领袖：民粹主义运动通常会围绕着一位领袖或者一群领袖展开，这些领袖通常不具有高学历、而是以从底层到走向成功的养成型形象出现，被认为能够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并且能够领导他们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些领袖通常受到追随者的强烈信任和支持。

(3) 倡导直接行使权利：民粹主义强调直接民主和直接行动，主张通过公民投票、公民罢工、示威游行等方式，让普通人民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而不是依靠代表制度。他们认为代表制度下，人选出的代表始终无法代表全体人的权益，一旦出现有别于普通人的角色，精英身份也就伴随而来，这会直接影响到民主意愿的表达与实现。

(4) 对外来势力和少数族群的排斥：民粹主义者往往强调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反对外来势力的影响，并且对移民、少数族群或宗教少数群体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威胁到本土文化和就业机会。民粹主义者通常会因为某种范围因素而进行人群的划分和归类，带有对异己群体的天然排斥和恶意揣测，如果不控制舆情的的发展，往往会朝着极端化方向发展。

(5) 政治简单化和情感化：民粹主义者倾向于简化复杂的政治议题，并且常常通过情感化的方式来吸引支持者，例如利用强烈的情感、简单明了的口号和标语等。传统民粹主义同民族主义一样，是一种“单薄—集中化”的意识形态[4]，一方面没有系统框架和主要的理论内涵，是破碎的混乱的，更多是一种情感的直接表达缺乏理论深度；另一方面民粹主义通常借助网络、文字宣传等方式进行情绪的宣泄和民粹宣传，因而也是集中的，其表现往往呈现出对社会的的不满和情绪的堆积。

3.2 网络民粹主义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舆论场错综复杂，民粹主义话语频繁闪现于网络空间，构成了民粹主义的网络衍生形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塑造了网络民粹主义的空间之维，传统的民粹主义思潮在技术的催化下逐渐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网络民粹主义延续和承袭了传统民粹主义以公平为核心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又呈现出一系列新动向、新特点，如传播议题的非核心性，传播主体的精英化、年轻化，传播方式的圈层化、场景化等。网络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在新时代的自我发展，是民粹主义者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结果。相比于传统的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的受众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深远。两者的相同点在于两者的核心理念和内在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强调普通人民的权益，要求直接民主以及普通人民直接行使权利，反对建制和精英。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传播和互动上，在其中网络民粹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高度互动性：网络民粹主义利用互联网的高度互动性[5]，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网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论坛、公众号、短视频等平台，快速地传播和接收信息，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有别于传统的舆论宣传，网络宣传途径因为其虚拟性和隐匿性，网络民粹主义者通过信息技术的传播途径，可以实现“软宣传”，也就是通过引导性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浏览者互动，并且让其在互动中实现被动的分组和自觉的立场抉择，使得民粹主义成为互动者“自发”选择，增强民粹主义者的认同度和归属感。

(2) 匿名性：网络民粹主义的参与者往往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这种匿名性使得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一些过激和偏激的言论。这些言论起初可能是出于民粹主义者的有意发表，也有可能是普通人单纯的情绪宣泄，但是一旦发布在公共平台，这个言论就会受到人为的评判和解释，最终都会被引导成民粹主义者的宣传话语体系之一。

(3) 情感化：网络民粹主义往往强调情感的表达，而非理性的思考。他们的观点往往基于对某个问题的情感反应，而非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这与网络社交平台“标题党”的原理相似，碎片化的时代人们往往不会记得一件事情的全貌，而是会对该事件的突出矛盾进行自我加工和阐释，最终这件事情将会以情绪的矛盾点进行扩散传播。而这就是民粹主义者最惯用的宣传手段，他们利用碎片化时代人们的阅读特点，制造事件情绪表达，然后引导社会人群对立，号召

反抗社会建制和表达对精英的不满和质疑，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所谓“平民政治”这一基础上的非理性的表达。

4. 网络民粹主义的“脱轨”表现

4.1 行为表达的方向性“脱轨”

民粹主义所提倡的平民主义思想在我国有一定的影响基础，关键在于其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有一定的相似点，都强调了人民的权益。但是网络民粹主义认为通往平民政治的唯一路径是反对建制和反对精英[6]，这显然是错误的。首先，社会建制是为了社会稳定而设置，社会稳定的受益者便是普通民众，一个没有建制的社会必然是混乱的，必然会回到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主导下的丛林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普通民众绝对不会是受益者，所以反对建制其实是无益于普通民众的，是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相背而行的。有别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实行古希腊一样的直接民主是不切实际的，要保证平民权益，那就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行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来确保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并且辅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制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来确保权利的运行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使得决策尽量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网络民粹主义之所以无法获得大部分群众的认可，是因为其始终坚持反建制的理念，这在本质上是脱离了其为了实现不利于一个社会的长期发展，而只是一种情绪宣泄的幼稚手段，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些思想会因缺乏理智的思考而被大众所抛弃。

4.2 行为对象的“脱轨”

“网络民粹主义否认人民的异质性，并赋予多数人合法性”[7]。民粹主义来源于对民主基本价值的追逐，但又构成对其的幻化与背离。民粹主义背离了民主的内在价值，是对民主、平等、公意等价值的歪曲与幻化。同时，民粹主义也跳脱了自由主义传统和共和主义传统对民主的外在规范性，是对主权在民、自由、多元价值，乃至对美德、参与价值的歪曲性理解。网络民粹主义声称要实现平民政治，在网络上大肆宣传权利的直接行使，号召更多的人拿起自己的互联网武器来对抗社会建制以及精英人才的不足，摸黑我国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甚至政府机关的形象，竭力在网络公共事件中解刨出对抗正统话语体系的元素，这是一种极端化的行为，是盲目的叛逆思想。在网络民粹主义者主导下的民粹主义体系之中，“异己”成为了最主要的行为对象，而“异己”已然由传统民粹主义的“精英”发展到包括在文化背景、思想个性、行为选择等层面在内的差异性个体，特别是具有自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个体。例如因染了粉红色头发而遭遇网暴，最终在绝望中结束自己生命的少女；例如对疫情形势判断失误而身败名裂的专家；例如虽用生命捍卫边防却被网友嘲讽的云南边防……他们对这些人群的攻击和排斥源自于他们对自主思考理性的恐惧，根本上在于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民粹主义思想逻辑基础的不稳定性。因此，他们的行为对象，也就是他们的“精英”范畴不断扩大，而“普通人民”范畴不断缩小。

4.3 行为选择的“脱轨”

网络民粹主义者习惯从反向逻辑进行行为选择。民粹主义者提倡平民政治，但是其并没有着重扩充平民的质量和数量，而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分化、割裂社会人群之中，把人民划分为“精英”和“普通人民”，民粹主义并不生产信徒，而是试图在社会正常运转的过程自身生产的人群之中去通过划分的模式来扩充队伍[8]。这种填充模式本质上就依赖于其社会建制的正常运转，否则民粹主义也会随着社会建制的破坏而破绽百出。

实质上我国的共同富裕远大理想是切合民粹主义理念的最终追求的,我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选择,在本质上已经消除了所谓“特权精英”的存在合法性;又以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在经济长远发展方向上消除了“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通过不断完善社会建制,我国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我国不断提高国民素质,促使更多的人平等地享有知识文化权益,掌握知识,在根本上消除国民差异;通过国家宪法以及各级法律条文,我国实现国民在国家地位和法律地位层面的公正平等,实现“平民”和“精英”的融合,而不是像网络民粹主义一样,把人民局限于“普通”的范畴体系之中,限制个性优势的发展。

5. 结语

如今部分欧美国家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了巨大的财富鸿沟,造成了阶层分化、固化并形成“阶级诅咒”,无形中给中下层民众戴上了“心理枷锁”,这正是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卷土重来的根本性诱因。而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网络民粹主义来势汹汹的背景下还能取得不错的发展成就,关键就在于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政治的不断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持续创新,我国的国民素质也会得到持续的提高,而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也最终会因为其非理性因素而逐渐丧失受众,苟延残喘。

参考文献

- [1] 薛寒欣.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政府应对能力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04):138-149
- [2] 孙雪梅.网络民粹主义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及其应对[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23,(01):35-39.
- [3] 李昂.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研究——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03):19-27.14-1294/g.2023.03.004.
- [4] 郑保章,孟翔宇.网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审视与治理策略[J].北京社会科学,2023,(10):4-12..231001.
- [5] 杨婕.网络民粹主义引发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治理[D].桂林电子科技大学,2023.2023.000951.
- [6] 滕国鹏,贾亦真.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对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的影响——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1):126-134. 1008-3758.2024.01.014.
- [7] 刘娜,刘佳.表征·演绎·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透视与审思[J].领导科学,2024,(03):80-86.2024.03.013.
- [8] 李博雅.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及其治理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23. 2023.000931